

随迁与留守子女认知能力及影响因素差异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 年数据

俞韦勤, 胡浩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度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家庭文化环境视角,分析了随迁与留守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随迁子女的认知能力显著比留守子女的高0.098;相对于留守子女,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环境更优,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亲子文化交流和亲子文化行为分别比留守子女高0.210, 0.449, 0.086, 0.373;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两类流动人口子女中家庭文化环境的促进效果略有不同,在随迁子女中,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在留守子女中,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交流的影响更显著。

关键词: 随迁子女;留守子女;认知能力;家庭文化环境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6-0049-08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the children liv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Based on CEPS (2013-2014) data

YU Weiqin, HU H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2013-2014) and P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cultural environmen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the children liv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children liv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is 0.098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children liv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has a better family cultural environment. Family cultural endowment, family cultural resources, parent-child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arent-child cultural behavior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by 0.210, 0.449, 0.086, 0.373. Family cultural endowment, family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amily cultural activiti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bility of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between two types of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amily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Among the children liv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arent-child cultural behavior are more significant.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ultural endowment, family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arent-child cultural interaction are more significant.

Keyword: the children liv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left-behind children; cognitive ability; family cultural environment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由此产生了随务工父母到流入地共同生活但户籍仍在人口流出地的随迁子女以及被留在

收稿日期: 2018-09-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33008)

作者简介: 俞韦勤(1993—),女,浙江湖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

户籍地生活的留守子女两个群体^①。《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不满16周岁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②两类群体总数达1亿。当前,随着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人口城市化推动留守子女逐渐向随迁子女转变,随迁子女群体日益庞大。调查显示,2005—2010年全国随迁子女增长44%,而留守子女仅增长4%^[1]。随迁或留守带来的环境变化必然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作为主体对外界信息接收、处理、储存的一种能力,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3]。青少年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和同伴群体得到提升^[4-6]。随迁或留守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差异,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学界就随迁或留守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了探讨。Xu & Xie 实证研究发现,与留守儿童相比,随迁儿童的数学测试成绩较好,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也相对较强^[7]。闫伯汉、周颖等分别利用不同的数据来源,发现随迁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子女的认知能力^[6,8]。佟雅图通过对四川和江西两地流动人口子女的调查,认为随迁子女在学习上处于明显劣势^[9]。李慧勤等发现师生关系、父母支持和友谊质量对认知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10]。张茜洋等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元认知能力呈现显著正相关^[4]。江求川指出家庭特征和学校资源的差异导致青少年认知能力的不同,并利用RIF回归分解方法发现家庭特征的不同是导致认知能力差异最主要的因素^[5]。

纵观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农村人口流动对其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多聚焦于“留守子女—农村完整家庭子女”和“随迁子女—城市本地子女”的比较,忽视了留守子女和随迁子女认知能力差异形成机制的阐释。在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方面,多集中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特征和同伴群体的影响,对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研究阙如。为此,笔者拟聚焦家庭文化环境研究视角,分析随迁与留守子女认知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差异。

二、分析视角与研究假设

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背景、家庭结构等都对孩子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4,11,12]。在认知能力形成的过程中,家庭环境起着

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最好的教育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文化环境包含了家长的知识水平、价值取向与品味,是家长教育理念的一种外化表现。目前,学界关于家庭文化环境的界定尚未统一。弗雷泽认为家庭文化环境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阅读习惯。Olivia N 等认为家庭文化环境包括儿童所有的家庭读写活动^[13]。舒华等则把家庭文化环境分为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文化资源、父母与孩子间的文化活动和儿童独立文化活动四个层面,其中家庭文化资源包括书籍、电脑等学习工具,父母与孩子间的文化活动包括父母每天的阅读时间、带孩子去书店等场所的频率^[14]。阮福金等认为在孩子独立文化活动中家长的作用较小,因此把家庭文化环境分为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15]。综上,本研究把家庭文化环境分为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

综上所述,建立如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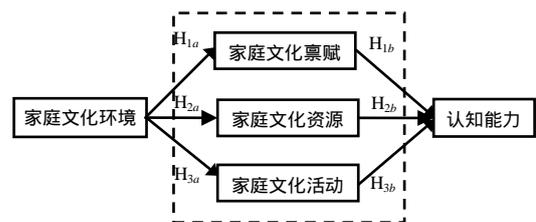


图1 家庭文化环境对认知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

1. 家庭文化禀赋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更优质的家庭文化禀赋意味着父母不仅对子女教育具有更强的偏好,而且还利于自身知识、理念的更新,对家庭文化投入往往更丰富,在代际之间具有教育再生产的传承关系^[16]。流动人口由于自身普遍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导致其经济地位较低,职业与收入不尽如人意,故而会把想要改变的愿望倾注在子女身上,成为一种教育期望^[17]。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亦会越高,同时也能很好地传递这种教育期望,最终转换为教育优势^[18,19]。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为实现这种期望,流动人口会为子女选择更优质的教育环境,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20],进而提高教育成就。基于中国城乡表现出的教育水平两极化的特点,提出以下假设:

- H_{1a}: 随迁子女相对留守子女家庭文化禀赋更优质
- H_{1b}: 家庭文化禀赋越优质,认知能力越强

2. 家庭文化资源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进入城市后,流动人口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都会受到城市影响,以城市的家庭教育作为标杆,自觉地向其靠拢,从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更新^[21]。随迁子女的家庭式迁移保持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便于将流动人口已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通过积累家庭文化资源落实在子女身上。因此,相对于留守子女,随迁子女具有更丰富的家庭文化资源。一般而言,家中占有的图书等文化资源越丰富,将会增加子女接触学习系统内外多种知识、接触认知刺激的机会,从而激发兴趣,提高认知能力与学业成绩^[22]。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_{2a}: 随迁子女相对留守子女家庭文化资源更丰富

H_{2b}: 家庭文化资源越丰富,认知能力越强

3. 家庭文化活动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家庭文化活动包括家长的言传与身教,是父母参与家庭教育最直接的方式。流动人口在教育水平上的劣势致使其提供回应性教养方式的能力有限,而更多地采取使子女自然成长的理念^[22]。但在进入城市后,教育理念的更新会令流动人口选择家长主导的文化活动作为一种对家庭教育的补充,弥补自身对子女教育“有心无力”的缺憾,优化家庭文化环境,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有效缩小与学校的差距,从而增加子女的教育获得,发展能力,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23]。并且,随迁子女完整的家庭结构顺应了家庭伦理规范,令代际间保持频繁的交流、互动。只有当代际之间存在充足的交流、互动时,知识才能得到有效的传递,子女能力才能得到发展^[24]。而留守子女与替代监护人并非为亲子关系,导致出现替代监护人监护职责不明确、监护意识不强等现象^[25],从而减少了家庭文化活动的频率,进而使留守子女相对于随迁子女在认知能力上表现出劣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_{3a}: 随迁子女相对留守子女家庭文化活动更频繁

H_{3b}: 家庭文化活动越频繁,认知能力越强

三、模型与变量选择

1. 模型选择

利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时,常常会因样本自选择产生内生性的估计偏误。解决内生性的方法主要有随机实验法、倍差法、工具变量法和匹配法。随机

实验法在实际操作中较为困难,倍差法常需要面板数据支撑,由于本研究为截面数据,因此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模型偏误进行修正。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设立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

$$cog_i = c_1 + c_2 znlx_i + c_3 X_i + \mu_i \quad (1)$$

(1)式中, cog_i 表示流动人口子女的认知能力, cog_i^0 表示留守子女的的认知能力, cog_i^1 表示随迁子女的认知能力; $znlx_i$ 表示流动人口家庭是否进行随迁这一决策,如果 $znlx_i=0$ 表示子女是留守子女,如果 $znlx_i=1$ 则表示子女是随迁子女; X_i 为影响子女认知能力的其他控制变量; μ_i 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引入反事实框架。根据子女、家庭和学校层面的特征估计是随迁子女的概率,得出倾向得分(P propensity Score)。以倾向得分为依据为处理组(或控制组)寻找一个反事实的控制组(或处理组)进行匹配。

最后,根据已匹配样本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平均处理效应(ATE)和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

$ATT = E[cog_i^1 - cog_i^0 | X, znlx_i = 1]$,表示随迁子女如果不随父母迁移,那么此时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成为留守子女时的认知能力的差异。

$ATE = E[cog_i^1 - cog_i^0 | X]$,表示随迁子女的认知能力和留守子女的认知能力的差异。

$ATU = E[cog_i^1 - cog_i^1 | X, znlx_i = 0]$,表示留守子女若随父母迁移其原来的认知能力和成为随迁子女后认知能力的差异。另外,使用了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另外,根据Judd & Kenny、Baron & Kenny和温忠麟等的研究^[26-28],通过以下三个标准验证家庭文化环境产生的中介效应:

$$cog_i = c_1 + c_2 znlx_i + c_3 X_i + \mu_i \quad (2)$$

$$M_{ji} = a_1 + a_2 znlx_i + a_3 X_i + \mu'_i \quad (3)$$

$$cog_i = c'_1 + c'_2 znlx_i + c'_3 X_i + b M_{ji} + \mu''_i \quad (4)$$

其中, M_{ji} 为中介变量, $j=1,2$ 。方程(2)和(4)分别反映了加入中介变量前后随迁子女与留守子女认知能力的差异,方程(3)反映了随迁或留守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要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则要检验 c_2 、 a_2 、 c'_2 、 b 是否显著且 c_2 是否大于 c'_2 。另外,在进行上述验证前,根据检验中介效应的要求,需要对所有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

2. 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化成绩。该成绩来自调查组设计的一套全国统一的认知能力测试卷,测试不涉及学校课程知识,而是以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 3 个维度、11 个类型的题目为测试内容,据此测量学生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测试卷分七年级组 20 题,九年级组 22 题,每题 1 分,要求学生课堂上限时 15 分钟集中答题,得到原始分后,用三参数(难度、区分度、猜测参数)的 IRT 模型估计最终标准化分数以衡量认知能力^③。

自变量为流动人口子女的类型。根据户口登记地和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两个问题判断流动人口子女的类型: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非户口登记地的随迁子女,作为处理组;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外出务工,在户口登记地生活的留守子女,作为对照组。并剔除调研当年入学的随迁子女样本,以保证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生活半年及以上。

家庭文化环境包括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选择父母最高教育程度衡量家庭文化禀赋。家中藏书量(不包括课本和杂志)作为家庭文化资源的观测变量。家中藏书量可能与家庭经济水平挂钩,从而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研究结果,因此,先检验多重共线性,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为 1.27 远小于 10,说明回归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符合变量选取要求。家庭文化活动从言、行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选择家长主动与子女讨论学校的事的频率和家长与子女一起去博物馆、科技馆等的频率作为观测变量。

控制变量从子女个体特征、父母及家庭特征以及学校特征三方面选取。首先,子女的随迁或留守状态并不完全由自己选择,而是父母根据子女性别、年级等特征来决定。因此,子女个体特征选择年龄、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健康状况。其次,

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子女的随迁或留守。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外出务工人员更可能选择携子迁移。因此,父母及家庭特征选择家中是否有因生病或身体不便需要照顾的人、家中经济状况。最后,学校特征也是影响子女随迁或留守的重要因素,优质的教学水平、优良的教学资源可以增加随迁行为发生的概率。相对于公立学校,民工打工子弟学校或其他民办学校由于入学手续便捷更可能吸引家长做出迁移决策。因此,学校特征选择本校初中部在本县(区)排名、每个教室平均的座位数量和学校性质。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2013—2014 年的调查数据。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 28 个县(市、区),并分别随机抽取 4 所学校,共 112 所学校。在每所学校的七年级和九年级随机抽取两个班,共计 19 487 名学生。调查内容涉及学生、家长、家庭关系、社区、学校等多方面的信息。

表 1 为本研究所选变量与样本特征。经过筛选得到全样本量共 3 899,其中随迁子女、留守子女的样本量分别为 1794、2105。全样本经标准化后的认知能力成绩均值为-0.134,随迁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值为-0.052,明显高于留守子女的-0.204,两者相差 0.152。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文化禀赋普遍偏低,仅为 3.625。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为 3.753、3.105,分别比留守子女家庭多 0.237、0.567。在家庭文化活动中,随迁子女的文化交流频率和文化行为频率分别较留守子女的高 0.106、0.603。在表 1 中还可以发现各个协变量在两类流动人口子女之间有明显差异。

表 1 变量定义与样本特征

变量名称	定义	全样本	随迁子女	留守子女
认知能力	课堂限时答题得分经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分数越高,表示语言、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越好	-0.134 (0.810)	-0.052 (0.842)	-0.204 (0.775)
家庭文化禀赋	父母最高的教育程度,分类变量,1~9,依次为没受过任何教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3.625 (1.501)	3.753 (1.574)	3.516 (1.428)
家庭文化资源	家庭藏书量(不含课本和杂志),分类变量,1~5,依次为很少、比较少、一般、比较多、很多	2.799 (1.170)	3.105 (1.144)	2.538 (1.128)
亲子文化交流频率	家长主动与子女讨论学校的事的频率,分类变量,1~3,依次为从不、偶尔、经常	2.138 (0.601)	2.195 (0.597)	2.089 (0.600)

表 2(续)

变量名称	定义	全样本	随迁子女	留守子女
亲子文化行为频率	家长与子女一起去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的频率,分类变量,1~5,依次为从未做过、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一次及以上	1.917 (1.189)	2.242 (1.274)	1.639 (1.034)
年龄	调查时年龄	13.998 (1.407)	13.994 (1.334)	13.964 (1.465)
年级	七年级=0, 九年级=1	0.438 (0.496)	0.386 (0.487)	0.483 (0.500)
性别	女生=0, 男生=1	0.519 (0.500)	0.0.509 (0.500)	0.527 (0.499)
是否独生	非独生=0, 独生=1	0.226 (0.418)	0.251 (0.434)	0.204 (0.403)
儿童健康状况	分类变量, 1~5, 依次表示很不好、不太好、一般、较好、很好	4.042 (0.900)	4.212 (0.853)	3.897 (0.914)
家中是否有需要照顾的人	没有=0, 有=1	0.137 (0.344)	0.083 (0.276)	0.183 (0.387)
家庭经济状况	分类变量, 1~5, 依次为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困难、比较富裕、很富裕	2.701 (0.633)	2.819 (0.556)	2.600 (0.677)
本校初中部在本县(区)排名	分类变量, 1~5, 依次为最差、中下、中间、中上、最好	3.746 (0.892)	3.621 (0.943)	3.852 (0.832)
每个教室的平均座位数	连续变量	51.140 (8.578)	48.024 (8.069)	53.796 (8.094)
学校性质	分类变量, 1~4, 依次为公立学校、民办公助、普通民办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1.303 (0.787)	1.346 (0.896)	1.267 (0.678)
观测值		3 899	1 794	2 105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同。

五、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由于本文选择 PSM 模型进行研究, 因此需在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 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平衡性检验, 以确认除被解释变量之外, 其他控制变量的系统性差异已被尽可能消除。通过平

衡性检验结果(表 2)可知, 匹配后的偏误比例皆已控制在 10% 以下, 偏误降低比例基本超过 50%, t 统计量不显著, 说明经过匹配后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表 2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类型	处理组(流动儿童)	控制组(留守儿童)	偏误比例/%	偏误降低比例/%	t 统计量
年龄	匹配前	0.159	-0.014	2.1		0.65
	匹配后	0.014	0.066	-3.8	-78.2	-1.15
年级	匹配前	-0.052	0.045	-19.6		-6.11
	匹配后	-0.051	-0.041	-2.0	89.6	-0.62
性别	匹配前	-0.010	0.008	-3.7		-1.15
	匹配后	-0.009	-0.000	-1.8	51.4	-0.54
是否独生	匹配前	0.026	-0.022	11.4		3.55
	匹配后	0.025	0.052	-6.4	43.6	-1.82
儿童现在的健康状况	匹配前	0.170	-0.145	35.6		11.06
	匹配后	0.168	0.211	-4.9	86.3	-1.53
家中是否有需要长期照顾的人	匹配前	-0.054	0.046	-29.8		-9.17
	匹配后	-0.054	-0.050	-1.2	96.1	-0.42
家庭经济条件	匹配前	0.118	-0.100	35.3		10.89
	匹配后	0.117	0.113	0.7	98.0	0.23
本校初中部在本县(区)排名	匹配前	-0.125	0.106	-26.0		-8.12
	匹配后	-0.125	-0.088	-4.2	84.0	-1.17
每个教室的平均座位数	匹配前	-3.116	2.656	-71.4		-22.23
	匹配后	-3.042	-3.153	1.4	98.1	0.41
学校性质	匹配前	0.042	-0.036	9.9		3.11
	匹配后	0.043	0.017	3.3	66.6	0.96

1. 随迁子女与留守子女家庭文化环境的差异

随迁子女与留守子女家庭文化环境差异的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经过控制样本自选择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两类流动人口子女在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的差距上相对于描述统计数据都有所下降,但仍具有统计意义,且随迁子女都优于留守子女,假设 H_{1a} 、 H_{2a} 、 H_{3a} 得到支持。就家庭文化禀赋而言,随迁子女家庭显著多于留守子女家庭0.166~0.210。在家庭文化资源方面,随迁子女显著比留守子女高0.426~0.449。这可能是由于随迁子女家长受到学校、同班家长的影响,自觉地向城市家长学习、模仿,希望缩小孩子与城市本地孩子的差距,从而增加了对家庭文化资源的投入。而留守子女父母可能因为事实抚育责任缺位,弱化了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关注,产生“有养无教”的结果^[29],因此家庭文化资源较少。在家庭文化活动方面,随迁子女亲子文化交流和文化行为的频繁程度分别显著高于留守子女0.051~0.086,0.313~0.373。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子女即使有替代父母的监护人存在,但碍于血缘、情感的疏离,替代父母的监护人监护职责不明确、监护意识不强令其对留守子女的关注程度与文化交流互动行为频率偏低。

表3 随迁子女与留守子女家庭文化环境的差异

	最近邻元法	半径匹配法	核匹配法
家庭文化禀赋	0.210*** (0.069)	0.182*** (0.067)	0.166*** (0.067)
家庭文化资源	0.449*** (0.051)	0.429*** (0.049)	0.426*** (0.055)
亲子文化交流 频率	0.086*** (0.031)	0.063** (0.025)	0.051* (0.028)
亲子文化行为 频率	0.373*** (0.060)	0.313*** (0.057)	0.319*** (0.065)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三种匹配法皆重复抽样200次,且半径参数 $r=0.001$,下同;上表报告了三类匹配法对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2. 家庭文化环境与认知能力

以上分析回答了随迁子女与留守子女家庭文化环境的差异。下面将通过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对家庭文化环境的相关回归,探讨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认知能力的差异。结果如表4、表5所示。根据表4可以发现,在流动人口子女总样本中,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能够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假设 H_{1b} 、 H_{2b} 、

H_{3b} 得到支持。但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子样本中,家庭文化环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不尽相同。在随迁子女样本中,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行为对其认知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家庭文化禀赋和家庭文化交流并不显著促进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这说明,家庭的教育再生产作用有限。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接触大量新鲜事物,而家长由于知识水平受限,无法提供城市学校对孩子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与习惯,且无法给予子女正确的相关指导^[19]。但文化资源与活动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可以开拓随迁子女视野,指导其接受新事物,从而提高认知能力。在留守子女样本中,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交流都对其认知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且亲子文化交流的影响系数最大。而家庭文化行为却无法显著影响留守子女的认知能力。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教育仍然比较落后,父母的教育程度尚且可以满足孩子的知识需求。另外,农村-城市的两极化导致农村的文化建设较为薄弱,村域内较少甚至没有相关场地可供家长与子女之间的文化行为互动,从而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较小。

在协变量中,流动人口子女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学校排名都会对流动人口子女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年龄、家中有无需要长期照看的人、学校性质和教室平均座位数具有负向效应。其中,年龄的负向效应指的是同年级中年龄越大,越不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

表5的结果说明,控制样本自选择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随迁子女认知能力比留守子女显著高0.098,相对于控制前的0.152有所下降。这与闫伯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6]。结合表4和表5的结果,可以发现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家庭文化环境的差异是造成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差异的原因之一。其中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的的影响系数相比于家庭文化禀赋的大。结合已有文献^[22]和本文统计数据,可以认为,由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水平,加之现代知识具有快速更新换代的特点,导致受限的家庭文化禀赋较难满足初中生的知识需求,在代际间产生低效的教育再生产,另外,初中生具有自主学习的特点,可以在自我利用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的实践中获得所需的知识,实现认知能力的发展。

表 4 家庭文化环境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

变量	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子女	留守儿童
家庭文化禀赋	0.020** (0.009)	0.016 (0.013)	0.023* (0.012)
家庭文化资源	0.060*** (0.012)	0.056*** (0.018)	0.057*** (0.016)
亲子文化交流频率	0.068*** (0.022)	0.052 (0.033)	0.078*** (0.029)
亲子文化行为频率	0.034*** (0.012)	0.047*** (0.163)	0.007 (0.017)
年龄	-0.091*** (0.013)	-0.123*** (0.021)	-0.083*** (0.018)
年级	0.161*** (0.036)	0.335*** (0.057)	0.062 (0.050)
性别	0.021 (0.025)	-0.028 (0.039)	0.072** (0.033)
是否独生	0.074** (0.031)	0.097** (0.045)	0.066 (0.042)
儿童现在的健康状况	0.032** (0.014)	0.033 (0.023)	0.024 (0.019)
家中是否有因生病或身体不便需要长期照顾的人	-0.086** (0.038)	-0.018 (0.070)	-0.123*** (0.044)
家庭经济条件	0.050** (0.021)	0.074** (0.036)	0.030 (0.026)
本校初中部在本县(区)排名	0.077*** (0.015)	0.081*** (0.022)	0.085*** (0.022)
学校性质	-0.046*** (0.017)	-0.037* (0.023)	-0.075*** (0.028)
每个教室的平均座位数	-0.006*** (0.002)	-0.009*** (0.003)	-0.002 (0.002)
常数项	0.004 (0.013)	0.036 (0.022)	-0.040** (0.019)
R	0.084	0.096	0.075
F 统计量	25.12	13.30	11.98
样本量	3 899	1 794	2 105

表 5 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认知能力的差异

	邻近匹配法	半径匹配法	核匹配法
随迁	0.098** (0.040)	0.128*** (0.033)	0.151*** (0.039)
随迁+家庭文化禀赋	0.094** (0.037)	0.100*** (0.032)	0.102*** (0.033)
随迁+家庭文化资源	0.085** (0.034)	0.090*** (0.028)	0.099*** (0.028)
随迁+家庭文化交流	0.081** (0.040)	0.091** (0.036)	0.083** (0.036)
随迁+亲子文化行为	0.077** (0.035)	0.097*** (0.034)	0.085** (0.037)

注：上表报告了三类匹配法对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六、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研究利用 CEPS2013—2014 年度调查数据，基于家庭文化环境视角研究了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在认知能力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相比于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环境更优，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亲子文化交流和亲子文化行为中分别比留守儿童高 0.210, 0.449, 0.086, 0.373；家庭文化环境中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可以正向

促进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但在两类流动人口子女中家庭文化环境的促进作用略有不同，在随迁子女中，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在留守儿童中，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交流的影响更显著；家庭文化环境上的差异造成了随迁子女的认知能力比留守儿童高 0.098。

上述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1) 鉴于两类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显著差异，应优化乡城流动政策，鼓励家庭式流动。子女的随迁决策受迁入地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教育机会等方面的约束。应维护流动人口的相关权益，使流动人口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和相应的收入。为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应制定和优化流动人口住房管理政策，保障其住有所居。在教育机会方面还要进一步降低升学门槛，保障随迁子女求学的连续性，满足随迁子女教育需求。此外，应将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补助纳入政府支出预算，填补此类学校的教育经费缺口，提高随迁子女的教育质量与硬件设施，增强迁入地流动拉力。

(2) 鉴于家庭文化环境对随迁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可通过家校合作，利用家庭读物，提高家长的知识水平，更好地契合子女的求知欲。由学校教师布置例如周末带孩子去博物馆、共同阅读等任务引导家长增加家庭文化活动频率，以弥补由于父母知识的有限性而产生低效文化再生产的缺失，让随迁子女可以在阅读、文化活动等实践中获得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

(3) 鉴于家庭文化环境在两类流动人口子女间的差异和家庭文化环境对留守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可通过诸如家长座谈会、亲子课堂、亲子课后作业等各项家校合作活动，加大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由学校引导留守子女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认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强化家长家庭教育意识与责任，切实增加亲子间的有效互动促进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另外，政府应加强村域范围内文化设施建设与设立留守儿童托管机构，以开拓留守儿童视野，弥补因家庭结构不完整所带来的关爱缺失。

注释:

-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子女。
 ② 该报告中流动儿童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年龄在18周岁以下人口;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守在户籍所在地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的18周岁以下人口。
 ③ 关于CEPS的调查的抽样方案和其他具体信息,请参考该数据的官方网站, <http://ceps.ruc.edu.cn>。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1):46-50.
- [2] Lindqvist E, Vestman R. The labor market returns to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enlistment[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1, 3(1): 101-128.
- [3] 黄国英,谢宇.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青年劳动收入回报的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17(2):56-64+97.
- [4] 张茜洋,冷露,陈红君,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2):153-162.
- [5] 江求川.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与城乡青少年认知技能差异[J].教育与经济,2017(6):21-30.
- [6] 闫伯汉.乡城流动与儿童认知发展——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2017,37(4):59-89.
- [7] Xu H, Xie Y. The casual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31(4): 502-519.
- [8] 周颖,杨天池.留守、随迁与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基于CEPS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教育与经济,2018(1):88-96.
- [9] 佟雅囡.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的比较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11):64-74.
- [10] 李慧勤,李晓双,王晓航.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五个县市的报告[J].教育研究,2017,38(7):115-121.
- [11] 姚昊,叶忠.家庭背景、教育质量与学生能力形成——基于CEPS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8,10(4):70-79.
- [12] 袁玉芝,叶晓梅.同胞结构对学生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7(3):34-38.
- [13] Olivia N, Saracho. Assessing the families' perceptions of their young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literacy[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00, 161(1): 83-91.
- [14] 舒华,李文玲,辜玉敏,等.家庭文化背景在儿童阅读发展中的作用[J].心理科学,2002(2):136-139+252.
- [15] 阮福金,周晖,李峰.家庭文化环境对幼儿语音意识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1):13-17.
- [16] 齐亚强,牛建林.教育的再生产:代际传承与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2(1):37-56.
- [17] 苑雅玲,侯佳伟.家庭对流动儿童择校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12,36(2):106-112.
- [18] 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4,34(1):175-195.
- [19] 周序.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2):73-77.
- [20] 杨习超,姚远,张顺.家庭社会地位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研究——基于CEPS2014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6(7):67-73.
- [21] 许传新.家庭教育:“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比较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2(5):59-62+19.
- [22] 刘保中.“鸿沟”与“鄙视链”: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基于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8-16.
- [23] 孙远太.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J].青年研究,2010(2):35-43+95.
- [24] 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社会,2018,38(6):216-240.
- [25] 王坤,刘影春.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及对策——对全国26省248个村的调查与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3(9):52-55.
- [26] Judd M, Kenny A. Process Analysis Estimating Mediation in Treatment Evaluations[J]. Evaluation Review, 1981, 5: 602-619.
- [27] Baron M, Kenny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1173-1182.
- [28]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29] 熊景维,钟涨宝.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J].中国农村观察,2016(4):40-55+95-96.

责任编辑:曾凡盛